

河南地方志丛书

019264

商丘县教育志

《商丘县教育志》编纂领导小组



中州古籍出版社

河南地方志丛书

商丘县教育志

编著 沈其丽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1年6月

商丘县教育志

编著 沈其丽

中州古籍出版社 (郑州农业路 73 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南省郑州信息工程所计算机部制版

(河南省郑州市纬五路 22 号西 3 号)

新华彩印厂 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4 印张 294 千字

1991 年 6 月第一版 1991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00 册

书号:ISBN7—5348—0547—2 / K · 138

定价:¥20.00

家庭教育手册

提高人口素质

刘瑞信

一九九二年

发展教育
振兴商邱

王师灿
九一二年元月

百年大計
教育為本

陳翠英

一九八二年九月

前言

本局专业志的编辑同志，自接受任务之日起，便埋头苦干，笔耕不止，经过8年的努力，终于使《商丘县教育志》脱稿了！现在把它奉献给为开创商丘县教育新局面而呕心沥血的广大教师，献给全县广大人民。

教育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人类的知识、技能、经验和道德行为规范的传递，社会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都需要教育来进行。振兴教育是关系人类前途和国家、民族兴旺的大问题。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

商丘是历史文化名城，自古文化教育事业发达。春秋战国、西汉、隋唐、五代及北宋、明朝中后期、清朝前期和清末废科举、兴学校时期，出现了几次教育高潮，出现了许多出类拔萃的人物。新中国建立后，在共产党员的领导下，商丘的教育事业健康地、迅速地向前发展，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

要改革、振兴商丘教育，必须充分研究商丘教育实践，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从中找出规律来。但商丘县从来没有过教育志，旧《商丘县志》对教育的记载只寥寥数语，从1705年（清康熙四十四年）到现在更是一片空白。因此，修一部具有商丘县特色的教育志，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商丘县教育志》的编修工作是从1982年开始的，在县委、县政府的关怀下，在县教育局党组的直接领导下，在全县教育战线广大同志的支持和帮助下，编辑人员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深入地进行社会调查，广泛征集了近800万字的历史资料，在此基础上大胆写稿，反复修改，力求达到“观点正确、体例得当、资料翔实”，力求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把资料性、思想性和科学性结合起来。

商丘县教育志

《商丘县教育志》分 15 章 53 节，采取志、记、传、图（含照片）、表、录各种体裁，以志为主。全书约 30 万字，其中近代、现代内容占 3/4，体现了“详今略古”的原则，全面地反映了从远古到 1985 年四、五千年间商丘县教育工作的历史和现状，具有存史、资治的作用。

但是，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赐教！

钟 绵 毅

1990、9、10

凡 例

一、本志结构为“分志并列体”，设 15 章。以概述、大事记为纲，以学前教育、察举与科举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中等专业教育、成人教育、体育卫生、勤工俭学、教学、人才培养、人物、党团工会组织、行政机构、经费诸章为主体，以附录作结尾。

二、上限不限，下限 1985 年。本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着重记述 1948 年全县解放至 1985 年的史实，详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发展变化，以体现时代特色。

三、本志采用记、传、志、图、表、录诸体，各章横分门类，纵写史实，述而不论。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方法表述，概述则叙中有议。

四、本志所载人物，以本县籍为主，兼顾外籍在商丘县长期工作并有较大影响者。传略、简介人物排列以出生时间为序，表中先进人物限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省、地领导部门命名的。

五、本志资料来自正史、旧志、专著、档案资料、口碑资料，文中不一一注明。所用数据，坚持“以统计部门为准”的原则，统计部门没有的数据，经核实后载入。历史纪年采用公历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各个时期夹注原纪年。

六、五完小、六完小、七完小、二中、三中、四中、商丘二高，是县城直属商丘市时的统一排号，不另加说明。

《商丘县教育志》

顾问 (按姓氏笔划为序)

丁德俊	朱云松	朱尊生	刘佩璧
张岫峰	张守义	张传欣	张保修
李正华	李荣先	陈策	陈一斋
杨子聪	杨夫芳	戴鑫	

领导组 (1982.5——1983.10)

组长	戴洪昌		
组员	陈锐丞	王龙祥	周子栋
	张清成	沈其丽	

领导组 (1983.10——1991.3)

组长	钟绵毅		
组员	袁东营	戴洪昌	王龙祥
	张清成	盛悦民	沈其丽

编著	沈其丽		
编采	王龙祥	王文治	熊乐人
	沈子洲	朱义平	王友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

沈其珩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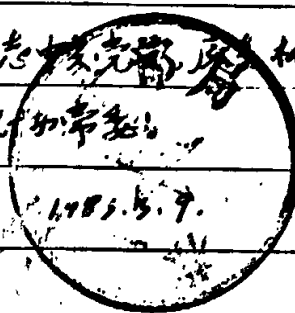
您寄来的《自忠中学简况》打印材料已收到。谢谢您的作，一件很有意义的作。

现在，自忠中学师生在北京市有
的十多人。为方便，请再惠寄二、三份来。
共同校正和增补，以保证史料的
准确。 核对了，请把原稿寄回。

人

敬请

张克侠同志：林生部付部长
批准全国政协常委



张克侠

83.3.1

沈其的同志：

您好！向您问好！您~~寄~~^为记日记写了一篇

很好的材料，反映了您在高中二年级时的生活情况。

我们全家都非常感谢您。最近我为写日记、日记整理

日记、您的文章对我帮助很大，高中我~~因~~^因难住，

但我并不了解您在哪里的生活情况。这篇文章

是否发表了，发表在何处，似乎您原来写信时谈

过，但我记不准了。所以又问您，如已发表请告知我

是何刊物。如未发表，我帮助您送到有关部门教

育^{编辑室}部的刊物~~出版~~。另外，我也想推荐给

商印是超编辑室，希望他的在贵社采用。我立即
想高，愿意州河，请回信。

心证

高文礼

杨静

1987.1.31

概 述

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必然有一定形式的教育相伴随。我国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有了“庠”、“序”等学校的萌芽。据《尚书·舜典》记载，在虞舜时代，就有专司教育的学官，为“司徒”，主持五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以契为之长。而契是商部落的始祖，商部落的发祥地是商丘。所以，商丘的教育是源远流长的。

奴隶社会，打破了氏族的狭隘界限，扩大了生产的规模，出现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一方面，奴隶的集体劳动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一方面，统治阶级垄断了教育，“学在官府，以吏为师”。奴隶主贵族很重视对子弟进行礼乐教育，使他们明君臣之义和长幼之序，掌握历法、天文、数学和占卜等方面的知识，出现了“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局面。

周朝时期，商丘是宋国都城。宋国是王者之后，保留有大量古代典籍，文化教育很发达，有国学、庠、序等官立学校。

春秋时期，诸侯国各自为教，形成不同的学风。周王室和宋、鲁两国是当时文化教育中心。孔子兴私学，打破学在官府的局面，对宋国很有影响，位列七十二贤的司马耕、原宪都是宋国人，孔子也曾亲来讲学习礼。

从战国到明清，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教育也呈现发展状态。战国时期，宋国是墨家学派的发祥地，道家学派和名家学派的活动中心，墨翟、庄周、惠施等人都在这里聚徒讲学，著书立说，参与百家争鸣。儒家学派在此地也有较大的影响，孟子曾率徒前来讲学。

在汉朝，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

后，形成研究经学的热潮，梁国都城商丘是经学研究中心，尤其是对《易经》和《礼记》的研究在全国很有影响。那时，有郡国学校和乡间的庠、序等官立学校；有教儿童的学馆、书馆和经师大儒自立的精舍、精庐等私学。

东汉末年，曹操重视教育，统一北方后，大兴学业。203年（建安八年），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500户置校官。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国家分裂，战争频繁，学校遭破坏。统治阶级实行九品中正制和士族制度，玄学兴起，私学兴盛。

隋朝实行科举制，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有了进士之途，读书人大增。唐朝统治阶级也很重视教育，州、县、乡都有学校，私学也很普遍。科举制度更为完备，科举考试的内容直接影响学校教育内容。进士科注重诗赋，学诗成为一种普遍风气，出现了崔曙等著名诗人，李白、杜甫的游历，更直接影响了当时的学风。安史之乱使学校遭到破坏，唐朝后期，教育一蹶不振。

唐亡后，国家分裂，统治者不关心教育，私学更为兴盛。出现了杨恽、戚同文等著名塾师。

北宋时，全国四大书院之一的应天府书院改为府学，又改为南京国子监，与东京（汴京）、西京（洛阳）的国子监并列，为全国最高学府。“学生相继登科，而魁甲英雄，仪羽台阁，盖翩翩焉，未见其止”，历一百余年而不衰。这是官府重视，民间热心，内行经办，名师训导的结果。

宋代以后，府、州、县学俱以儒家经典为教学内容，故称儒学。元初城中建文庙、府学，乡村每社建一社学。

明初，商丘称归德州，建有州儒学。升州为府后，新置商丘县，州儒学升为府儒学，又新建县儒学。明朝，学校对学生的思想控制很严，不许评论政治，并用八股取仕制度来加强封建专制统治。清代承袭明代的学校制度和考试制度，因为县学、府学名额有限，所以社学、义学和私塾在城乡仍存在。

鸦片战争以后，官办的归德府学、商丘县学名存实亡，平时学生不到校上课，考试不过是所谓教授到考课地点点学生的名册和收收学生献给老师的贽币钱而已，有钱人甚至连考试都不需要参加就可以买到贡生、监生、举人等名额，而有些无钱的儒子到胡子白还什么都考不上。有人写一对联对此种情况进行讽刺：

上钩为老，下钩为考，考老童生，童生考到老。

二人为天，一人为大，天大人情，人情大过天。

因此，科举中第人数大减，有 20 科竟无一人得中。

1905 年(光绪三十一年)8 月废科举后，新式学校在本县出现，府建中学堂，县建高等小学堂，后又建初等小学堂。这是本县近代教育的开始，但学堂规模小，学生人数也少。在本县近代教育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井俊起。他虽身为清末举人，但思想开明，在废科举当年 11 月，即发起成立私塾改良社，对私塾进行改良。

民国成立后，学堂改称学校，禁用清政府的教科书，废止读经讲经。县知事、同盟会会员孙金章（外号孙大麻子）重视教育，常到人多的地方招众劝学，凡自愿上学的就给 600 个钱，上学之人逐渐增多。民国元年，本县有省立中学 1 所、县立小学 6 所。但因战乱、匪患灾荒，学校屡遭破坏。据 1913 年（民国二年）省视学视察教育报告记载：“商丘县和睢县初等小学虽已开学，但多属敷衍塞责”。1922 年(民国十一年)5 月 10 日至 12 月 31 日，冯玉祥为河南督军，推行许多开明措施，如剪辫子、放足、兴建学校，本县风气大开。城乡的一些祠堂和庙宇也相继改建为学校。当时流行着这样一首儿歌：“天不怕，地不怕，不怕神来吓，我盼大士归南海，又盼众神回老家，留下房屋办学校，普渡众生小娃娃”。这时学校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但为时不久商丘成了军阀混战的战场，学校时开时停，设备毁于炮火，上学之人寥寥无几。1928 年(民国十七年)省政府颁发庙产兴学令，并决

定每丁银一两附加教育经费 2 角——4 角，因教育经费有较多增加，各级学校也有所发展。1930 年(民国十九年)蒋、冯、阎大战，豫东是主要战场，学校又一次遭破坏，这年教育局长 6 次易人，混乱程度无以覆加，全县仅有河南省立中学 1 处，县立师范 1 处、完小 6 处、初小 10 处。全县人口 67 万，学龄儿童 15 万，在校儿童 2413 人，入学率不足 2%，教师只有 97 人（其中女 4）。1931 年(民国二十年)县教育自治，县立初级小学经费完全收回，各区公立小学先后停办，在校学生仅剩 2000 人。1932 年(民国二十一年)县教育行政会议决定，县款办县立学校，各区另筹款办各该处初级小学，才建区立小学 51 处。但到六、七月间，大水为灾，秋粮无收，儿童入学率大减，区立小学多数关闭。省督学视察商丘教育报告内称：“农村经济及经济基础摧毁无余，农民救死之不暇，当然无力出款为自己办教育，且无心令子弟受教育”，“此处经济状况，而望该县‘自治教育’之发展，乌乎可！甚至有少数自治工作人员，假政府之名义，发生向人民敲榨之事实者，则更不一而足，似此不知自治为何物之自治工作人员，而望其兴办与人民切肤之痛的教育，难矣！”。1933 年(民国二十二年)奉令征收亩捐，教育经费增加，才相继建立 245 处区公立小学。秋季，教育经费被裁减，学校仅存 68 处。截止到 1935 年(民国二十四年)，全县受过大学教育的仅有 27 人，受过中等教育的 317 人，受过小学教育的 1273 人，成人识字者约 21000 人。虽然行政院修正通过《实施义务教育暂行办法大纲》，但本县因教育经费无着，根本没有执行。另一方面由于仅有的学校注意了教学质量，学术研究空气渐浓。县师生组织文艺研究室，将每学期学生研究心得笔记集稿出版一次；商中师生中也出现了一些文艺团体，出版了《铁血》月刊，《驼铃》月刊；县民众教育馆编辑出版了《商丘教育旬刊》。1936 年(民国二十五年)万献五为教育局长，整理课租收入，整顿县立各校，偿还